

当代中国
人文社会
科学学科
发展丛书

二十世纪中国的

社会学本土化

郑杭生 王万俊 著

李士志
化學全集

二十世紀中國的

当代中国
人文社会
科学学科
发展丛书

二十世纪中国的

社会学本土化

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社会学本土化
从世界到中国的理论与实践

郭锐生 编著

党建读物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二十世纪中国的社会学本土化/郑杭生,王万俊著. --北京:党建读物出版社,2000.7

ISBN 7-80098-447-8

I. 社… II. ①郑… ②王… III. 社会学-理论研究 IV. C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15825 号

责任编辑:汇 慧 责任校对:周一苇 封面设计:燕 童

党建读物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万寿路西街甲 7 号 邮编:100036 010—68219430)

新华书店经销 河北省徐水县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9.375 印张 234 千字

2000 年 7 月第 1 版 2000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2000

ISBN 7—80098—447—8/C · 029 定价:26.50 元

本社版图书如有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010—68278452)

目 录

前言	(1)
第一章 社会学本土化若干基本理论问题	(10)
第一节 社会学本土化的内涵与目的	(10)
一、社会学本土化——从地区性到世界性	(10)
二、社会学本土化的内涵——从界说看本土化的目的	(16)
第二节 社会学本土化的类型和特征	(24)
一、社会学本土化的主要类型	(24)
二、社会学本土化的基本特征	(30)
三、对社会学本土化的若干误解	(35)
第三节 社会学本土化与社会学西方化、国际化、全球化	(41)
一、社会学西方化	(42)
二、社会学国际化	(45)
三、社会学全球化	(51)
第二章 社会学本土化在国外的变迁	(57)
第一节 20世纪50年代以前的社会学本土化	(57)
一、美国社会学的本土化	(58)

二、拉美地区社会学的本土化	(61)
三、日本社会学的本土化	(66)
第二节 20世纪50年代后的社会学本土化	(69)
一、拉美地区社会学的本土化	(70)
二、亚洲地区社会学的本土化	(79)
三、非洲地区社会学的本土化	(90)
四、加拿大社会学的本土化	(95)
第三章 20世纪上半叶社会学本土化在中国的变迁	(101)
第一节 传入阶段与发展阶段：社会学的制度化过程与本土化过程	(101)
第二节 中国社会学传入阶段的本土化倾向	(105)
一、严复对社会学本土化的尝试	(105)
二、章太炎社会学学术研究中的本土化倾向	(111)
第三节 中国社会学发展阶段的本土化努力	(115)
一、国外社会学成果的译介与社会学本土化(中国化)运动的兴起	(115)
二、对社会学本土化(中国化)的倡导和研究	(118)
三、社会学研究方法的本土化探讨	(128)
四、对本土社会的调查的拓展和深化	(156)
五、社会学理论的本土化构建	(169)
第四章 恢复重建后中国社会学的本土化探索	(180)
第一节 社会学本土化运动的再次勃兴	(182)

一、对社会学本土化的再次倡导	(182)
二、对社会学本土化理论问题的探讨	(186)
第二节 对本土社会的研究和认识	(193)
一、对中国社会的结构和运行状况的研究和 认识	(193)
二、对中国社会的变迁发展的研究和认识	(196)
三、对中国社会多种社区的研究和认识	(199)
四、对中国社会婚姻家庭问题的研究和认识	(202)
五、对当代中国社会问题的研究和认识	(204)
第三节 社会学研究方法的本土化改造	(209)
一、中国社会转型的研究方法	(210)
二、中国社会贫困现象的测量方法	(213)
三、对中国社会指标体系的研究和设计	(215)
四、探寻适合于研究中国人社会心理与行为 的方法	(218)
第四节 具有本土特色的社会学理论的 初步形成	(221)
一、小城镇理论	(222)
二、社会运行理论	(228)
第五章 全面推进中国社会学的本土化	(236)
第一节 夯实社会学本土化的基础	(236)
一、进一步转变社会学研究者的观念和认识	(237)
二、全面深入地了解并批判地吸收外来社会 学的成果	(242)
三、充分发掘并有选择地利用本土社会有关 的历史资料和资源	(250)

第二节 抓住社会学本土化的关键	(259)
一、社会学理论研究的进一步突破	(259)
二、社会学应用研究的进一步改进	(266)
三、大力提高社会学研究的可靠性和有效性	(273)
第三节 从多方面为社会学本土化提供 保障	(276)
一、深化社会学教育教学的改革	(277)
二、重视对社会学研究进行宏观调控	(286)

前　　言

“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并不是一句套话，更不是一句空话，而是有实实在在的内容的。这可以从纵横两个方面——历史方面和理论方面来加以说明。

关于历史方面，我们已经出了两本书，这就是我和李迎生合著的《二十世纪中国的社会学》，又名《中国社会学的发展：历史、现状与前瞻》（党建读物出版社 1999 年 7 月版）和《中国社会学史新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9 年 12 月版）。中国社会学史已被确定为社会学系 10 门主干课程之一。^①《中国社会学史新编》因而成为该门主干课的一本最新的教科书。

关于理论方面，就是这一本我和王万俊合著的《二十世纪中国的社会学本土化》，又名《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社会学本土化从世

^① 1999 年 7 月于陕西师范大学召开的全国高校社会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暨社会学系主任联席会议上确定了大学本科社会学专业 10 门专业主干课，它们是：社会学概论、社会调查研究方法、国外社会学理论、中国社会思想史或中国社会学史、社会统计学、社会工作概论、社区概论、社会心理学、经济社会学、发展社会学（社会现代化）。会议同时决定：以全国高校社会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名义编写和出版这 10 门专业主干课的教学大纲。这些共识和做法得到了国家教育部有关主管部门的大力支持。此外，还达成了对本、专科社会工作专业 8 门专业主干课的共识。它们是：社会学概论、社会工作导论、个案工作、小组工作、社区工作、社会行政、生活保障、社会调查研究方法。

界到中国的理论和实践》，它是《二十世纪中国的社会学》的续集。

我们认为，只有把纵的历史方面和横的理论方面结合起来，才能较为完整地体现出 20 世纪中国社会学的真实面貌，也才能较为完整地理解有中国特色社会学的内涵。

在国家教育部“高等人文社会科学教育面向 21 世纪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计划”中，我承担了社会学的一个子课题“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研究”。上述三本书都是这一课题的成果。它们就是按照“把纵的历史方面和横的理论方面结合起来”的思路来设计和规划的。

20 世纪的中国社会学，特别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为什么应当从“社会学本土化从世界到中国的理论和实践”这样一个具有很强理论色彩的新视角来考察呢？或者说，为什么要单独写这样一本书呢？

第一，社会学在中国本土化的问题，即社会学中国化的问题，应当从社会学在世界各国本土化这一更开阔的眼界来加以考虑。了解社会学本土化在中国以外的国家和地区的历史、现状及其经验教训，以及围绕社会学本土化出现的种种思潮，对于用世界的眼光来研究社会学中国化，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参考。因为社会学中国化毕竟是世界社会学本土化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

第二，社会学中国化在社会学在世界各国的本土化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在社会学变迁史上，本土化作为一种自觉的群体性的学术活动取向，率先出现于 20 世纪 20、30 年代的拉丁美洲（尤其墨西哥）社会学界和中国社会学界。对墨西哥和中国来说，社会学最初均是从欧美国家传入和引进的，所接受的社会学知识原本是对欧美社会现实的反映且有浓厚的西方文化特征。到 20 世纪 20 年代后，随着社会学学科在这些国家的逐步制度化以及本土社会的社会学研究力量的增强，如何在社会学研究中重视本国的社会现实、社会特性、文化传统并在此基础上寻求社会学理论的创

新，几乎同时引起了墨西哥和中国一些既熟知西方社会学知识又具有强烈的反省意识的社会学者如墨西哥的曼努埃尔·加米奥、中国的许仕廉、孙本文等的关注。这两个国家特别是中国，因而在世界的社会学本土化的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中国社会学界，更广泛一点说，中国社会科学界当然不能忽视这一点。

第三，社会学中国化与社会学的国际化有密切的关系。随着国际交流的增多，中国的发展日益引起国际注目，中国社会学的国际化也日益突出。所谓国际化，在我看来，应当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中国社会学成为世界社会学不可缺少的一支，具有与国际社会学界对话的能力和地位，从而得到国际社会学界的承认；二是中国社会学家能从世界的高度，从整个人类实践的高度来解释中国社会和建构中国的社会学理论。这两个方面也是相依不离的，后者是前者的内在本质，前者是后者的表现形式。这样的国际化不仅不与社会学的中国化相矛盾，而且正是以社会学的中国化为前提的。这就是说，我们的社会学只有真正本土化了，才有可能真正国际化。因为，如果中国社会学对西方社会学理论亦步亦趋，言必称西方如何如何，不能建构自己的理论，没有自己的特色，不能描述、解释、预测和指导中国社会，这种社会学无论对于世界还是对于中国都没有任何实际意义。这样的社会学显然不可能真正国际化。无疑，研究和深入了解西方社会学是十分重要的，但我们必须吸收其中精华的、适用于中国的东西。社会学的国际化与本土化的关系，就是这样一种普遍与特殊的关系，二者是对立的统一。从这一角度看，研究社会学本土化问题也不是可有可无的。

第四，社会学中国化问题涉及学科和现实、传统与现代、中国与外国的关系。作为一门学科，社会学是在 19 世纪末和 20 世纪初传入中国的，至今已有百年的历史。我们已经指出：中国社会学百年，可以分为两大时期，这就是以新中国建立为界，分为前一段近 50 年的中国早期社会学和后一段 50 年的中国当代社会学。中国

早期社会学，1919年以前，主要处于一个翻译和介绍国外社会学的阶段，即传入阶段，而1919年至1949年，则进一步处于一个社会学研究和教育不断拓展、深化的阶段，即发展阶段。无论在传入阶段还是发展阶段，无论在前50年还是后50年，无论是包括乡村建设学派、综合学派和社区学派在内的学院派社会学，还是马克思主义派社会学，都无时无刻、自觉不自觉地在处理着社会学与中国社会现实、与中国学术传统特别是中国历来的社会思想、与外国社会学和社会思想的关系，并且正是在这种处理中实现了并且还在实现着自己的创新作用和具有自己的中国特色的。从这一方面来看，中国社会学百年的发展轨迹，可以简明地概括为四句话，这就是“立足现实，开发传统，借鉴国外，创造特色”。换言之，对两大系社会学来说，都把现实的中国社会作为自己的立足点、出发点和归宿点，都以不同形式为现实服务。这是中国社会学的优良传统。在中国，从来没有那种单纯的“为学术而学术”的社会学。他们也都注意吸取几千年历史上丰富的社会思想，特别是关于社会治乱兴衰的思想，以此来观察现实的中国社会，并对西方传入的社会学给予带有中国特色的解释。社会学的中国化，首先当然是立足现实，同时也是与开发传统分不开的。他们还都注意借鉴国外社会学，其中包括欧洲、美国和日本的一些理论和方法。正是在立足现实、开发传统和借鉴外国的基础上，他们进行自己的创造。在早期，严复用治乱思想给社会学定义，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用“差序格局”来说明乡土社会划分群己人我界限时所形成的一种社会结构格局，等等，就很有中国特色和创造性。在中国社会学恢复与重建后，小城镇理论和实践、社会转型论、社会运行论等，则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理论中较有影响的几种。

关于社会学本土化的问题，现在看来，有几点在社会学界大体达到了共识：

1. 所谓中国社会学的本土化，从本质上说，就是要求中国社

会学能正确地描述和解释中国的社会现实,预测社会发展的前景,从而有助于中国社会的实际发展。

2. 在当今中国,社会学本土化的问题是与社会学的发展方向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本土化问题的正确解决,是以社会学发展方向的正确选择为前提的。所谓指导思想,就是我国的社会学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一方面从中学习领会他们观察社会生活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一方面掌握他们对中国社会一些基本问题的论述。离开这些,中国社会学本土化的问题就会失去正确的方向,从而不可能得到正确解决。

3. 当今中国社会学本土化的标志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理论和方法的形成。这里所谓中国特色,就是中国社会学必须首先立足于中国的社会实际,去调查、去研究、去概括、去总结,同时,又要深入研究中国社会史和中国社会思想史,从中国丰富的社会思想资料中,从悠久的优秀传统中吸取养料。

4. 本土化并不是排外化、全盘拒斥,当然,本土化更不是外国化、全盘照搬。可以说,本土化本身就包括借鉴、扬弃国外社会学,特别是西方社会学的问题。

在处理学科和现实、传统与现代、中国与外国的关系上,我们主张汲取现实社会的新养料,中国古代和国外一切精华的、适合中国国情的东西,进行综合创新,既不同意全盘西化、也不同意国粹主义,既不同意中体西用、也不同意西体中用。

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的、汲取中国古代社会思想和国外社会学精华的、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理论和方法,是中国社会学本土化的主要目标。到 21 世纪,这样的社会学本土化将随着研究社会转型加速期的深入而加速进行。如果本书能够对中国社会学的这一进程有所推动和裨益,我们将感到非常欣慰。

二

本书有下述特点：

第一，重探索创新。无论在世界还是在我国，系统地研究社会学本土化的专著还很少见，《二十世纪中国的社会学本土化》(又名《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社会学本土化从世界到中国的理论和实践》)这本专著，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一不足。

在世界社会学变迁史上，社会学本土化发生于社会学学科的跨国、跨地区、跨文化的传播和交流过程之中；社会学本土化运动早在20世纪20—30年代就出现于社会学学科的后发展国家或地区之中。然而，时至今日，国外社会学界的学者们虽然已对社会学本土化问题作了一些探讨，但研究尚不深入，缺乏系统性，以社会学本土化为主题的理论研究成果颇为少见。我国社会学界对社会学中国化(本土化)问题的关注，亦有70余年的历史，发表了一些论文，出版了几本很有价值的论文集，但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对社会学本土化必要性或重要性的强调以及对社会学本土化实施的提纲式的设想方面。在这样一种学术背景下，本书以社会学本土化为主题，较为系统地研究了社会学本土化的涵义、类型、特征、相关概念等基本理论问题(第一章)，在大量资料的基础上考察了从世界到中国的社会学本土化的历史和现状(第二、三、四章)，探讨了全面推进社会学中国化的策略(第五章)等，可以说是一项具有探索性和一定创新意义的研究工作。我们深深意识到这种性质的研究工作所具有的二重性：一方面它有某种学术价值，即一项称得上“具有探索性和一定创新意义的研究工作”，必定能够对本学科在学术上增加某种新因素、新颗粒、新东西；另一方面它又有不完善性，即作为探索性研究工作成果提出的理论观点，所建构的理论分析框架只是初步的，需要在今后的研究工作中加以进一步完善和

充实。

第二，重事实根据。作为一项“具有探索性和一定创新意义的研究工作”，当然会提出许多新的观点和看法，而所有这些新的观点和看法都来源于事实材料，都是有根据的。也就是说，本书在研究社会学本土化问题时，力求以社会学本土化的事实为根据，通过概括和抽象，进而提出我们关于社会学本土化的观点和看法。

我们的社会学本土化的定义，即“社会学本土化是一种使外来社会学的合理成分与本土社会的实际相结合，增进社会学对本土社会的认识和在本土社会的应用，形成具有本土特色的社会学理论、方法的学术活动和学术取向”，就是在尽可能充分地了解和把握世界范围内社会学本土化的历史和现状的基础上，以本土化的事实在根据提出来的。这一定义，既概括了各种类型社会学本土化共同的发生机制，又反映了社会学本土化所具有的多层次目的。又如，关于 20 世纪上半叶中国社会学的本土化，一些学者直觉式地认为这一时期中国社会学本土化并未取得什么实质性的成就。本书第三章通过对 20 世纪上半叶中国社会学本土化的考察，说明了这一时期社会学本土化具有多种表现形式，在增进社会学对中国社会的认识和在中国社会的应用方面以及在理论、方法的修正和创新方面取得了一系列实质性的进展。再如，不少学者以为，社会学本土化是发展中国家的一种独有的现象。本书通过对美国、日本、加拿大等发达国家有关情况的考察，认为社会学本土化也存在于发达国家的变迁和发展过程之中，尽管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社会学本土化的“化”的对象、本土化的展开方式、本土化的难易程度等方面存在着种种差别。我们认为，只要社会学的世界格局主要由强势社会学与弱势社会学并列而构成，社会学本土化总会存在于该学科处于弱势状态的国家或地区之中。

第三，重类型分析。对社会学本土化进行类型学分析，可以说是贯穿于本书的一个主要理论视角。

在第一章第二节中,我们从展开方式的角度将社会学本土化区分为“运动型”和“非运动型”两种类型,从成果形态的角度将社会学本土化区分为“本土化理论问题研究型”、“本土社会认识型”、“本土社会问题解决型”和“修正-创新型”四种类型。在随后的几章里,我们运用第一章第二节所构建的社会学本土化的类型学分析框架,较系统地研究了社会学本土化在国外的变迁历程(第二章),剖析了中国社会学本土化近百年来的变迁过程(第三、四章)。如在第二章里,我们考察了作为非运动型本土化范例的美国社会学本土化和日本社会学本土化,分析了作为运动型本土化的范例的拉美地区社会学本土化、印度社会学本土化、加拿大社会学本土化等;同时,还尽力结合社会学本土化的变迁历程,论述了本土化理论问题研究型、本土社会认识型、本土社会问题解决型和理论、方法的修正-创新型在这些国家或地区的具体表现。

了解这些特点,将帮助读者更易于把握本书。

三

我的合作者王万俊是一位年轻学者。1993年获得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社会学硕士学位。1997年考上了我的博士生,方向是“社会学理论及其应用”。他已经发表过《略论舒茨社会学对胡塞尔现象学的批判性应用与传播》等20余篇文章。在他攻读博士学位不久,就写过关于我的社会学思想的文章《中国特色社会学的开创性研究》。必须说,他对我的社会学理论观点及思路把握得十分深入、得体,对我以前写的东西运用得非常合适,并作了很好的发挥。特别是他花了很多的功夫、很长的时间收集有关的可以收集得到的材料,做了扎实的基础工作。这就是为什么我向他布置任务(1997年10月27日)较早,而出书较晚的原因。这次我们的合作方式是:先一起确定提纲——在我1998年4月初去日本前讨论过,提纲初稿

初成于 1998 年 10 月 26 日，改于 11 月 2 日，再改于 11 月 6 日，到我 1999 年 1 月 31 日回国后，又数度讨论才正式定稿。在他于 1999 年暑假期间集中起草全书初稿时，对其中一些问题又共同多次进行了讨论。9 月中旬完成初稿后，再由我进行修改、调整、补充、定稿，成为现在这个样子。我很高兴王万俊在真刀真枪承担这一课题中得到了锻炼，有了很大提高。

最后，我愿意再次重申：尽管笔者力求全面，但是由于中国社会学百年发展的复杂性和曲折性，对其中的一些问题本来就有不同看法，加上我们主观上种种局限，疏漏、不当之处在所难免，引起争论也无可避免。写本书，对我们自己来说是一次再学习、再检验的过程；它也可以看做是我们向社会和社會学界上交的一份作业。我们期待着对本书的指正和评论意见，期待着对其中的有关问题进行学术争论。如果本书对普及社会学的知识，扩大社会学的影响、促进社会学的学科建设能够尽到一点绵薄之力，我们将感到由衷的高兴。

郑杭生

1999 年 11 月 23 日于中国人民大学资料楼 912 室